

Ideology  
and  
Utopia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德〕卡尔·曼海姆 / 著

Karl Mannheim

 江西教育出版社

WESTERN CLASSICS

了如指掌·国学正典

#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 *Ideology and Utopia*

*Karl Mannheim*

【德】卡尔·曼海姆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 (德) 曼海姆著 ; 姚仁权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 2014.1  
(了如指掌 · 西学正典)  
ISBN 978-7-5392-7256-6

I . ①意… II . ①曼… ②姚… III . ①意识形态—研究  
②乌托邦—研究 IV . ①B022②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5475号

##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YISHIXINGTAIYUWUTUOBANG

---

作者：(德) 卡尔·曼海姆

---

出 品 人：傅伟中  
策 划：周建森  
组稿编辑：万 哲  
责任编辑：万 哲  
特约编辑：杨文建  
装帧设计：了如指掌创意馆

---

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  
字数：242千字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ISBN 978-7-5392-7256-6  
定价：29.80元

---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42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永不落架的书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能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早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

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深刻地透视今日。

——编者

# 目 录

<b>第一章 问题的初步探讨</b> .....	1
第一节 思想的社会学概念.....	1
第二节 思想的当代困境.....	5
第三节 现代认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观点的根源 .....	11
第四节 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个问题的对集体无意识的控制 .....	26
<b>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b> .....	43
第一节 概念的定义 .....	43
第二节 历史视野中的意识形态概念.....	47
第三节 从意识形态的特定概念到总体概念 .....	50
第四节 客观性和偏见 .....	55
第五节 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的转变 .....	59
第六节 非评价性的意识形态概念.....	65
第七节 从非评价性到评价性意识形态概念的过渡 .....	68
第八节 非评价性意识形态概念中暗含的本体论判断 .....	70
第九节 虚假意识问题 .....	73
第十节 通过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分析探寻现实 .....	76

<b>第三章 科学政治学的前景：社会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b>	85
第一节 为什么不存在政治科学.....	85
第二节 知识的政治和社会决定因素.....	91
第三节 各种视角综合成的一个政治社会学问题 .....	114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社会学问题.....	119
第五节 政治知识的本质 .....	128
第六节 政治知识的可交流性.....	134
第七节 三种知识社会学 .....	144
<b>第四章 乌托邦思想 .....</b>	151
第一节 乌托邦、意识形态与现实问题 .....	151
第二节 愿望的满足和乌托邦思想.....	161
第三节 乌托邦思想结构的变化：在现代各阶段 .....	166
第四节 当代形势下的乌托邦.....	195
<b>第五章 知识社会学 .....</b>	207
第一节 知识社会学的性质和范围.....	207
第二节 知识社会学的两种类型.....	209
第三节 对传统认识论片面性的证明.....	228
第四节 知识社会学的积极作用.....	229
第五节 知识社会学领域中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技术问题.....	240
第六节 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概括.....	242
<b>译者后记 .....</b>	245

# 第一章 问题的初步探讨

## 第一节 思想的社会学概念

本书关注的是人类事实上是如何进行思考的问题。这项研究的目的不是去考察逻辑教科书上的思想是什么样的，而是去考察作为集体行动工具的思想，在实际上是如何在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

哲学家们专注于他们自己的思想已经非常久了。当他们写到思想时，他们的脑海中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史，或者像数学或物理学这样的相当专业的知识领域。这种思想类型只在相当特殊的条件下具有可应用性，而且通过分析这种思想类型所学到的东西是不能直接转移到别的生活领域中的。即使在它具有可应用性的时候，它的可应用性也仅仅是针对存在的某个特定纬度而言，而这个纬度是不会让致力于理解和塑造自己世界的活着的人类满足的。

再者，行动中的人们已经创造出了通过经验和理智洞穿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系列方法。还没有任何一种所谓的精确认知方式对这个世界的分析能达到与之同样的精确度。不过，一旦任何一种行动，如果在不受理智控制或批评的制约的情况下长期进行的话，那它就倾向于彻底失去掌控。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正常现象之一就是一直不承认一种方法并也因此一直未能使这种方法受到理智控制和批评。而我们却使用这种方法做出了我们那些最为重要的决定，通过这种方法为我们的政治命运和社会命运寻求诊断和指导。社会知识的意义会相应地随着社会进程的规则干预的必要性的增加而增大。不过，所谓的前科学的不精确的思想模式（矛盾的是，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在他们不得不做出实际决定时，也使用这种方法）不是仅靠使用逻辑分析所能够理解的。

它是一个复杂体，这个复杂体不易脱离隐含于自身的情感上的激烈冲动的心理学根基，也不易脱离它所致力于解决而又产生了它自身的环境。

本书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创造出一个适宜于描述和分析这种思想方式及其演变的方法，就是去描述与这种思想方式相关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会给这种思想方式的独特性以公正待遇，也会为对它的批判性理解铺平道路。这里，我们要呈现的方法是知识社会学的方法。

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观点是，有一些思想方式，只要其社会根源是模糊的，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只有个人才能思考，这的确是正确的，不存在像集体心灵这样的可以凌驾于个人大脑之上而思考、可以使得个人仅仅只能复制其思想的形而上的实体。但却不能由此推论，所有导致个人思想和情感的根源仅仅在于个人自身，也不能推论，这些思想和情感可以仅仅以个人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而得到充分的解释。

个人说话时使用的语言不是他自己的语言，而是他的同时代者和为他做好了铺垫的前辈们的语言。试图通过观察单一的个人而推导出一种语言是不正确的。同样，要想解释某个观点的总体性，仅仅求助于个人思想中的这个观点的总体性起源，也是不正确的。只在相当有限的意义上，单一的个人才是从自己那里创造出我们归属于他的那种言语方式和思维方式。他说的是他的群体的语言，他按照他的群体的思考方式思考，他发现，只有某些词及其含义归他自由掌握。这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走进周围世界的道路，也同时表明了，至今为止，在哪种角度上、在怎样的行动环境中客体对群体以及个体而言已经是可以理解和可以接近的了。

至此，我们不得不强调的第一点是，知识社会学从本意而言，并不开始于单一的个人及单一的个人的思想，也不是为了在有了这样的开端以后按照哲学家的方式朝着“思想本身”的抽象高度行进。相反，知识社会学所致力于理解的是处于历史环境的具体背景下的思想。存在着个人差异的思想就是很缓慢地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下的。因此，进行思考的不是人的总体，甚至也不是进行思考活动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特定群体中的人，这个群体已经从对他们的共同处境所具有的某种典型情境所做出的无休止的系统反应中，创造出了一种特定的思想模式。

严格地讲，说单一的个人思考，是不正确的，而认为单一个人参与了对他之前的别人已经思考过的东西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则是较为正确的。他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继承过来的环境中，同样被继承的还有适宜于这个环境的思想模式。他试图进一步地详细阐明那个继承过来的思想模式，或者，为了更好地应对由于他的环境的转型和变化而产生的新挑战去试图用别的思想模式取代它。因此，每个个体都在两层意义上受到了在一定社会中成长的这样事实的预先决定：一方面他会发现一个既成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会发现处于这个环境中的既成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

知识社会学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它不把具体存在着的思想方式从集体行动的环境中分离，在理智意义上，我们是通过这样的环境才首次认知世界的。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们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仅仅在物理意义上共存。他们不是作为思考着的心灵而从这种心灵的抽象层面去面对世界客体，他们也不是完全作为孤立的存在而面对世界客体。相反，他们在种种组织化的群体中彼此一起行动，也进行着反对彼此的行动，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彼此一起思考，也思考着如何反对彼此。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成为群体，根据他们所属的群体的特性和处境而奋力改变周围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者力图在既定的条件下保持这样的世界。正是这种要改变或保持的意向带来了理解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概念和他们的思想方式的出现的线索。根据他们所参与的集体行动的特定环境，他们总是倾向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看待环绕着他们的世界。纯粹的逻辑分析使个人的思想同其群体的环境相分离，同样，这样的分

析也使得思想与行动相分离。这里的分析暗含的假设：以思想为一方，群体和行动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天然联系总是存在着的，但是这种联系要么对“正确”的思想是没有意义的，要么就是可以毫不困难地从产生它的基础中分离。但是忽略某事物的事实绝非终止了该事物的存在。

情况也许是，对某些知识领域而言，正是行动冲动首先使得世界客体对行动主体而言是可接近的。进一步而言，正是这种因素决定了那种进入了思想的现实要素的选择。并非不可能的是，如果这种意志因素被完全排除（因为这种事情是可能的），概念的具体内容会完全消失，使问题的理智表达成为可能的那种组织原理也会不复存在。

但这并不是说，在那些对群体的附着和朝着行动方向的定位似乎成为环境的根本要素的领域里，任何理智的、批判性的自我控制的可能性都是毫无结果的。也许正是在迄今为止被掩盖了的思想对群体存在的依赖性及其行动根源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才真正有可能通过意识到这些，而获得一种新的控制以前没有受到控制的思想因素的方法。

这些把我们带到了这本书的中心问题。这些论述应该明白专注于这些问题及它们的解决方法将会为社会提供一个基础，将会回答诸如政治生活的科学指导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当然，在社会科学中，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的确是在对客体的考察中发现的，知识社会学也无法取代这一点。但是，对客体的考察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它发生于环境之中，而环境是会打上价值的以及无意识的意志性冲动的烙印的。社会科学中，正是适应了集体行动的母体的这种理智兴趣，不仅为研究和组织经验的思想模式提供了一般性问题，也提供了具体假设。只有当我们成功地把离开事实和接近事实的各个点带入到有意识的和明显的观察领域，而这种事实又是流行于科学和大众化的讨论之中时，我们才有望产生无意识的动机和预先的假定，而在我们最后的分析中，正是这些无意识动机和预先假定导致了这种思想方式的产生。社会科学的新型客观性是可以达到的，但这不在于对评价的完全排除，而在于对社会科学的批判意识和控制。

## 第二节 思想的当代困境

思想的社会和行动根源的问题显现于我们这一代绝不是偶然的。至今为止，推动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那种无意识逐渐发展到意识高度并因此能够受到控制，也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看不到是特定的社会环境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的知识的社会根源，那我们就无法承认这种社会环境和我们的困境有什么关联。知识社会学的根本洞见之一就在于认识到那种使得集体无意识的动机变得有意识的进程并不是每个时期都会产生，而只在相当特殊的环境中才会发生。这种环境在社会学上是可以确定的。人们能够相对精确地指出那些一直迫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思考世界事务，还思考思考本身的因素，甚至还会比思考真理更多地去思考同样的世界在不同的观察者那里样子是不同的这样令人警醒的事实因素。

很显然，这些问题只有在分歧比赞同更明显的时代里，才能变得很普遍。只有在由于面对众多存在根本分歧的定义而不再可能对关涉事务和环境的概念进行直接的、持续不断的详细阐发时，人们才会从直接观察事物转向思考思想方式。至此，我们能够比总体的和正式的分析所可能做到的更精确地指出，在哪种社会和理智环境中，这个把注意力从事物转移到不同的观点，再从这里转移到思想的无意识动机的转变必然发生。接下来，我们希望指出在这个方向上起作用的少数几个显著的社会因素。

首先，当社会的稳定状态支撑并保持着世界观的内在统一性时，就不可能存在思考方式多样性的问题。只要词的同样含义以及推导思想的同样方式被从童年时代起就灌输到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在这样的社会中，就不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过程。甚至，只要思考新问题的方式的改变速度慢得超过几代人，思想方式的逐渐调整（这应该会碰巧发生），也不会被群体成员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某人及其同代者在自身的生命历程中是几乎不可能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的。

但是除了历史进程的显著动力之外，在思考方式的多样性变得引人注目并作为反思主题出现之前，必然还有相当不同的别的因素登场。如此说来，

主要是社会流动的强化，摧毁了流行于静止社会中的那种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可以变化的，但思想却是永远同一的、早先时候的幻想。就主要是社会流动的强化。而且，两种形式的社会流动，平面的和垂直的，以不同的方式在显现思想方式的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作用。水平流动（从一个方位移动到另一个方位，或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另一个国家，但社会地位不变）向我们表明的是，不同的人的思考是不同的。然而，只要某人的民族的和地方的群体中的传统不被打破，他就会如此地附着于这种传统的习惯性思考方式，以至于他感觉到的别的群体的思考方式都会被他认为是奇怪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或者是异端性的。在这一阶段，人们既不怀疑自己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思想总体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只有在水平流动的同时伴随有激烈的垂直流动，即在社会性上升或下降意义上阶层间的快速移动的时候，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形式的普遍和永恒效力的信仰才会被动摇。垂直流动是使得人们对自己关于世界的传统看法产生动摇和怀疑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即使在只有很微弱的垂直流动的静止社会中，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同阶层也有着不同的体验世界的方式。在其宗教社会学中清楚地显示了农民、工匠、商人、贵族和知识分子对同一宗教的体验常常不同，这正是马克斯·韦伯<sup>[1]</sup>的功劳。在依照封闭的地位或等级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垂直流动的相对缺乏，要么使得不同的世界观彼此隔绝，要么使得这些封闭地位或等级中的人们——比如，有过不同的宗教体验——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诠释这一宗教。这就解释了以下事实：不同等级的多种思考方式没有在同一个脑袋中汇集，因此也就没有演变成问题。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决定性的变化会发生在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从前彼此隔绝的阶层开始相互交流并开始形成一定的社会循环。这种交流的最显要的阶段则出现在这个时候：此时一直是独立发展的思想和经验形式进入了同一种意识，这种意识促使大脑去揭示相互冲突的世界概念间的

---

[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第四章第七节，《宗教社会学：等级、阶级和宗教》（图宾根，1925），第267—296页。

不相容性。

在很稳定的社会中，仅仅存在着较低阶层的思想方式向较高阶层的渗透。这意义不大，因为主导性群体仅仅感知到可能存在的思想变革并不会导致他们理智上的动摇。只要一个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的，并且社会声望是根据高级阶层的成就来确定的，那么这个高级阶层就没有理由使自己的社会存在、自己的成就的价值受到怀疑。除了相当程度的社会跃升以外，低级阶层的崛起要使该阶层的思想获得公共意义，<sup>[1]</sup>还必须以普遍的民主化为前提。首先，这种民主化过程使得以前没有公共效度的低级阶层的思想方式获得效度和声望成为可能。当民主化阶段来临时，低级阶层的思考技艺和思想会首次能够在同一效度层面上直面主导阶层的思想。而且，同样是在此时，这些低级阶层的思考方式和思想会首次迫使那些在自身框架内部思考的人让自己的世界客体接受根本质疑。正是由于每一种都声称具有代表性效度的思想方式间的碰撞，才产生了作为回报的、在思想史上既至关重要又非常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的出现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即：关注同一世界的相同的人类思想过程是如何能产生不同的世界概念的？而仅仅只需从这一点上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提出下述问题：此处所提到的思想过程难道就不可能根本不同吗？在人们考察了人类思想的所有可能性之后，难道就没有可能发现存在着大量可供选择、可被遵循的道路吗？

在雅典民主中，唤起西方思想史上的第一次怀疑主义的伟大浪潮的难道不就是那种社会跃升过程吗？希腊启蒙时代的诡辩家们难道不是一种怀疑态度的表现吗？这种怀疑态度本质上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在他们思考每一个客体时，都总存在着两种解释方式的冲突。一种是神话学。它是已经注定会走向没落的主导贵族的思考方式。另一种则是正处于上升过程的城市手工业者低级阶层的更具分析性的思考习惯。

因为这两种解释世界的方式都在诡辩家的思想中汇集；因为对每一个符

---

[1] 因此，例如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如同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那样，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实用主义使一种思维技巧和一种认识论合理化，它把日常经验的判断尺度抬高到了“学术”水平。

合道德的决定而言都至少存在着两个可行的标准；因为对每一个宇宙事件和社会事件而言都至少存在着两种解释，所以，难怪诡辩家的关于人类思想价值的观念是怀疑性的。同样原因，以教育者的方式责怪他们在其认识论成果方面是怀疑论者，是不中肯的。他们就是勇敢地表达出了那种每一个可能真正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的人所感知到的东西，即：那种规范和解释从前所具有的明确性被撼动了，而且只有对这种矛盾进行全面的置疑和透彻地思考，才能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这种普遍的动摇绝不是一个世界注定要走向总体腐朽的征兆，而是一个健康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代表的是一场将导向复兴的危机。

进一步而言，苏格拉底勇敢地跃进了怀疑主义的深渊，这不正是他的美德吗？他最初不也是一个使用那种提出问题然后再提出更深一步问题的技法的诡辩家吗？并且，他把这种技法变成是他自己的了。难道他不是通过甚至比诡辩家还彻底的质疑克服危机，从而找到一个至少就那个时代的观点而言表现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基础的理智依靠点的吗？因此，规范世界和存在世界最终在他的质疑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进一步而言，他至少像关注事实本身一样强烈地关注关于个人是如何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判断同样事实的问题。即使在思想史的这个阶段，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是：各个时期的思想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在于对客体的关注，还在于揭示出涉及到这些问题的观点的确并不相同的原因。

能够解释主导的思想形式的早期的统一性和后来的多样性的，除了这些社会因素以外，还应提及另一重要因素。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社会群体，他们承担着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解释的专门任务。我们称之为“知识阶层”。社会越是静止，这个阶层越有可能在这个社会中获得明确界定的身份或等级地位。所以，巫师、婆罗门和中世纪的教徒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阶层。他们都在各自的社会中享有对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以及重构或调和别的各个阶层的以朴素方式形成的世界观中的差异的垄断性的控制权。就此而言，布道、忏悔、训诫，都是使得不同的世界概念，在社会发展还没有到达那么复杂的程度时得到调和的手段。

这种组织成了一个社会等级，垄断着的布道、训教和解释世界的权利的知识阶层受两个社会因素的力量的限制。这个阶层越是把自己变成一种充分组织化了的群体（比如教会）的拥护者，其思想越倾向于“经院主义”。它必然要赋予以前只对一个派别有效的思想方式以教条性的约束力，并以此承认隐含于这种思想方式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它必须对外界呈现为统一战线，以推动这一转变。同样促成了这一转变的还在于社会结构内部的权力集中可能显著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成功地，把统一的思想和行动强加到至少是自身等级内部的成员。

这种垄断性思想类型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它相对远离公开性的日常生活的冲突；所以在此意义上，它也是“经院性的”，即学术的和无生命力的。这种思想类型并不主要产生于它同具体生活问题的斗争，也不主要产生于试验和错误，同样也不主要产生于掌握自然和社会的经历，而它更多产生于自身系统化的需要，这种系统化一直把在宗教和别的生活领域中出现的证据产生的原因追溯至既定的、传统的、不受理智控制的假设。这里讨论中所显露的敌意，在体现经验方式间的冲突方面要逊于同一社会结构内的各种权力阶层，因为这些权力阶层在做这种体现时是极力支持各种可能存在的、教条化的传统“真理”的解释方式的。这些假设的教条化内容是这些不同群体的出发点，所以这种“真理”思想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证明这种教条化内容的正当性，但是，如果以事实证据之标准来判定的话，这种教条化内容的大部分竟然是偶然性的。只要这种内容是依赖于那个派别碰巧成功地使自身的理智传统和经验传统变成教会的整个教士阶层的传统（与政治历史命运相一致），那它就完全是偶然性的。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现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事实是，同中世纪的情形形成对比，那种教士阶层坚持的教会关于世界的解释垄断地位被打破了，而且，自由知识阶层已经取代了全面组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自由知识阶层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成员越来越来自不断变动着的阶层，越来越来自不断变动着的生活环境，其思想方式也不再受到类似等级组织的支配。由于不存在自己的社会组织，这种知识阶层能充分表达出这种思想方式和经验方式，

从而同更大世界的别的阶层展开竞争。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随着等级存在形式的特权被拒斥，主宰知识生产方式的就开始是自由竞争了，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种知识阶层，以至今为止最明显的方式接纳社会上所有可能的、差异性也是空前的各种思想方式，并使这些思想方式间彼此争斗，处于竞争之中。只要这些思想方式为了赢得公众（不是那种教士公众）的那种一旦它们自己不努力就不可能得到的青睐，而不得不展开竞争，他们就的确会彼此争斗。人们之所以强调为了赢得各种公众群体的青睐而竞争，是因为只有突出的思想方式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表达它，并获得越来越高的效力。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不再有只存在一种思想方式的幻想。此时的某个知识分子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一个阶层或等级组织的一个成员，而这个阶层或组织的思想方式就能完整代表他的思想。在这个相对简单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下述事实的解释：直到教士对知识的垄断崩溃时，现代世界对思想的根本质疑才开始。那种几乎完全一致接受并被人为保持的世界观，在它的产生者的垄断性社会地位被摧毁时，也会分崩瓦解。随着知识分子从严格的教会组织中解放出来，别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得到承认。

教会的知识垄断地位的瓦解使得知识繁荣空前的急速涌现。不过，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统一教会组织的解体却也导致了，自远古以来就一直保持着的对思想统一性和永恒本质的信仰的动摇。现今时代的深度不安就可以回溯至这一时期，尽管最近还有别的本质上十分不同的因素也参与了这一过程。从现代人的深度不安的首次高潮中，产生了新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有认识论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而如果没有这些，今天的我们甚至要表达我们的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将试图在下一节中显示，至少在主要的线索上显示，很多对我们而言是可行的质疑方式和调查方式是如何产生于这一整个社会环境的。<sup>[1]</sup>

---

[1] 《论垄断思想的性质》，参阅卡尔·曼海姆《精神领域中竞争的意义》，在苏黎世召开的第六届德国社会学学会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见《德国社会学杂志》第六卷（图宾根，1926）。